

僑務委員會補助僑務學術研究計畫

佛光大學

泰國臺商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結案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撰寫人：陳尚懋教授

聯絡電話：03-9871000#11051

E-mail: smchen@mail.fgu.edu.tw

全球與在地雙重鑲嵌下的泰國臺商*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陳尚懋

從曾經擊敗紐約時代廣場（Time Square）等地，獲得全球 Instagram 熱門打卡地點第一名—曼谷購物商場暹羅百麗宮（Siam Paragon）向東出發，沿著臺灣遊客熟悉的蘇坤威路（Sukhumvit Road），在交通順暢下約 40 分鐘的車程，即可看到一座宏偉宮殿式建築：暹羅代天宮，從 1970 年代起保佑前往泰國發展的臺灣人，後於 1992 年正式奠基於此。與泰國常見的小乘佛教寺廟截然不同，雕樑畫棟、莊嚴肅穆，彷彿把曼谷的塵囂隔於廟門之外。踏入廟埕，遙想當年來泰國打拼的臺灣人，帶著全家人的希望，捻起一柱清香，祈求神明保佑在泰國發展一切順利。

而在距離代天宮不遠處的即是臺灣人在泰國的重要組織，已經成立超過七十年的臺灣會館，同樣承載著臺灣人在海外打拼的辛苦與盼望，在過去數十年來見證許多臺商的發展起伏。第 28 屆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劉樹添，即是發展成功的典範之一，1947 年出生於臺灣彰化，1981 年在台成立「第一琺瑯」，並於 1985 年即榮獲「第八屆青年創業楷模」，爾後於 1989 年前往泰國投資設廠，初期相當不順遂，一直到 1997 年 7 月 2 日在泰國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讓劉樹添的琺瑯鍋具生意因為泰幣貶值而獲利暴增，才站穩了泰國的生意。而後更希望將自己的經驗傳承給在泰國打拼的臺灣人，熱衷參與社團，經過多年社團經驗的累積，劉樹添於卸下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長的重擔之後，更進一步於 2020 年接任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或許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也是在泰國台灣商會

* 本文獲得僑務委員會補助僑務學術研究計畫。特此致謝，然文責作者自負。研究成果將收錄於海外臺商的專書之中。

聯合總會創會會長余聲清的奔走之下，1993年7月20日於台北正式成立，並由余聲清擔任創會的第一屆總會長，顯見泰國臺商組織的重要性。

泰國臺灣會館除了有目共睹劉樹添總會長的成功之外，卻也見證更多臺商發展的失敗案例。一如當年出走臺灣一般的情況，許多臺商近幾年也面臨到泰國土地與薪資成本上漲的壓力，或許面臨到下一代不願意接班、無力進行產業升級，也更早已不具當年勇氣，向外找尋成本更低廉的生產基地。新冠疫情的爆發宛如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泰國的國內市場從一開始就不在許多臺商的規劃之中，因疫情導致國外代工訂單銳減，在未能及早進行市場調整的情況之下，不得不關閉工廠、解雇員工，以減少損失，結束一切返回臺灣。而乏人問津的廠辦、土地與積欠銀行的大筆貸款，至今還留待疫情過後才能解決。然而看不到盡頭的疫情，也讓不少臺商感嘆：這一路走來，艱苦誰人知？

臺商主要指「跨越了本身的民族國家疆域到全球各地進行投資活動的臺灣商人」，他們在1980年代末開始逐漸成為臺灣與國際社會之間一股重要的政經勢力（蕭新煌、龔宜君，2002）。依據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vestment, BOI）之資料顯示，自1959年起至2019年止，臺商在泰國累計投資金額約為153.3億美元，投資核准數為2,493件，為僅次於日本與美國的第三大外資國（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21），同時是臺商投資第九大國，以資通訊、汽車零件、金屬、紡織、食品及相關產業為主。初估在泰臺商約有五千家，臺僑人數約在十五萬人左右，顯見泰國一直是臺商投資的重點國家。

臺灣人前往泰國發展，雖然最早可以追溯至日據時期，但較具規模的臺灣移民主要是從1960年代開始。泰國政府於1961年正式推動第一次的六年「國家經濟發展計畫」（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1961-1966）¹，1966年根據先前通過的「產業獎勵法」（Industrial Promotion Act），成立「產業投資促進委員會」（Board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而後於1972年更名為前述的投資促進委員會，並沿用至今。產業獎勵法歷經1960年與1962年的兩次大幅修訂，1977年時整併成為「獎勵投資法」（Investment Promotion Act），同樣歷經1991

¹ 從第二次計畫開始，加入社會發展的概念改名為「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NESDP）。

年、2001 年與 2017 年數次修正後的版本制訂投資政策，擴大獎勵投資的事業範圍，主要目的在於引進外來力量協助泰國經濟與產業發展，因此泰國企業紛紛聘請有經驗的臺灣專業技師前往指導。

由於當時臺灣仍處於戒嚴狀態，一般民眾出國必須經由主管機關核准²。不少臺商當年就是以商務理由申請許可後，前往泰國工廠擔任技師、工程師、廠長等專業技術人才或高階管理人才。根據資料顯示，1973 年時臺灣技術人員在泰工作的人數為 449 人，佔全泰國外國技術人員的 34%，可見臺灣技術支援泰國在當時的重要性（曹淑瑤，2003：278）。在累積多年的經驗、人脈與資金後，這群專業技師另起爐灶自行創業，出現臺商投資泰國的第一波高峰，並在往後成為臺商社群的骨幹。另一方面，由於當時臺灣除有出境管制外，也有外匯管制³，不少臺商被迫只能透過機械設備等方式對泰國進行投資。至於其他突破限制前往投資的臺商，主要是憑藉自己與當地的連結關係而前往，其中大多是被歸類為「夕陽工業」的中小企業。

國民政府於 1949 年播遷來臺初期，蔣介石仍懷抱著反攻大陸的夢想，但隨著國際情勢的發展，遭遇諸多的阻礙，也讓當時政府施政轉向經濟發展，積極建設美麗寶島復興基地。在許多技術官僚領導之下，展開貨幣改革與土地改革，透過農業支持工業下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成功，進而轉型成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也讓臺灣經濟從 1960 年代開始起飛，統計從 1960 年至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這段期間，臺灣維持每年 10% 左右的經濟成長率，形成舉世矚目的臺灣經濟奇蹟，也成為許多經濟發展理論教科書與課堂上的討論案例，包括：發展國家論（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認為臺灣的國家機制因為具有高度自主性與職能，因而能有效主導整體的經濟發展政策；依賴發展理論（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y）認為臺灣在高度依賴的情況下，並

² 一直到 1979 年 1 月 1 日，政府公布的「國民申請出國觀光規則」正式實施後，除了 16 到 30 的男子因為兵役問題除外，於臺灣地區設籍的中華民國國民，每年得以申請兩次出國觀光，出國觀光時間，每年合計不得超過三個月。這對於現在買了機票帶上護照就可以出國的民眾來說，應該很難以想像。

³ 中央銀行於 1979 年 1 月 24 日訂定「指定銀行辦理外匯存款辦法」、「指定銀行買賣即期外匯辦法」、「指定銀行買賣遠期外匯辦法」、「中央銀行對指定銀行外匯買賣及資金兌換辦法」等。而後於 1979 年 2 月 1 日正式建立外匯市場，廢除外匯清算制度。之後 1987 年 7 月 15 日配合政府解嚴，行政院院會決議：為維持國內金融穩定，對於匯入款項及支付有形、無形貿易以外之鉅額匯出匯款仍予繼續適度管理外，自本 1987/7/15 日起停止管理外匯條例第 6 條之 1、第 7 條、第 13 條及第 17 條之適用。中央銀行也因而廢止「外幣或外匯互兌辦法」等十二項限制，大幅放寬外匯管制。

未如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陷入低度發展，其中的關鍵在於國家機制、本地資本家與外資三者所形成的鐵三角關係（蕭新煌編，1985：259；胡祖慶譯，1990：122）；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則認為國家向上或向下流動是少見的，而臺灣則是少數由邊陲上升到半邊陲的成功案例（龔宜君，2005：205）。

根據世界體系理論的劃分，全世界的分工體系存在著「核心」：已開發的工業化國家、「邊陲」：以出口原物料為主的未開發或已開發國家、「半邊陲」：一方面支配邊陲國家；另一方面又受到核心國家的剝削。當核心國家能夠擴張而且自足，那邊陲與半邊陲國家的擴張與自立便受到制約。而分工位置是會流動的，邊陲有可能往半邊陲與核心國家移動，當然半邊陲國家也有機會往核心國家移動。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臺灣與其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即成功由邊陲國家移到至半邊陲國家，成為具有資本輸出能力的後進工業國（latecomers），自 1980 年代後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經濟全球化或資本輸出更具體來說，即是跨國企業在其營運活動的跨國界整合所成就的，其中的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乃重要的核心議題（周素卿、陳東升，2001，2002）。

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在出口導向工業化的帶動之下，國內外都出現許多鼓勵或迫使臺商出走臺灣的推力，成為海外直接投資的外流動力。首先在國內因素方面，根據政府相關統計資料顯示，新臺幣兌美元大幅升值，從 1983 年的一美元兌 40.06 新台幣，一路升值到 1992 年的一美元兌 25.16，升值幅度高達 39%。在地價漲幅方面，1980 年時公告土地現值調幅達到 91%，1991 年時又再達到 97%。至於工業及服務業的每人每月總薪資從 1980 年的 8,843 元新台幣，調漲到 1993 年的 31,689 元新台幣，漲幅高達 258%。現任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郭修敏受訪時提到 1984 年去泰國時，員工一天的薪資是 60 元泰銖，月薪大約 2,000 元泰銖左右，換算當時的匯率約 1,200 元新台幣，大約是臺灣薪資的十分之一。以上因素都讓許多出口導向的企業經營成本大增，被迫將生產基地直接移往海外。根據經濟部投審會於 2006 年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所做的「國外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分析報告（調查年度：2005 年）」顯示，臺商前往泰國投資的動機最主要即是當地低廉的勞工成本與土地成本。

臺灣資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將資金從一個衰退中的領導部門轉移到另一個興盛中的領導部門，讓臺灣更深入鑲嵌在原先的半邊陲位置，以避免其他邊陲國家的追趕，包括：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四小虎。儘管晉身到半邊陲國家和其後的邊陲國家之間的關係很曖昧（蕭新煌編，1985：258），但邊陲的東南亞還是成為半邊陲的臺灣資金被挑選中的對象，其中泰國更是產業外移投資的第一站（龔宜君，2005）。如此被動的國際化（pa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或是防衛性的對外投資（defensive FDI），將生產基地外移至成本低廉且地理鄰近性較高地區的發展（周素卿、陳東升，2001：430），基本上也符合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所提出的雁行理論，技術與產業不斷向下移轉，由一開始的雁頭日本，向下移轉至亞洲四小龍的臺灣，接著再向下移轉到泰國。

隨著 1987 年解嚴，臺商大量前往海外投資，也讓臺商投資泰國出現第二次的高峰期。根據投審會的資料顯示，1986 年時，臺灣的海外投資金額為 5691.1 萬美元左右，但到了 1987 年，投資金額暴增到 1.02 億美元，1988 年倍數成長到 2.19 億美元，1989 年更是成長到了 9.30 億美元，1990 年超過 15.52 億美元，短短五年期間成長超過 26 倍。至於在泰國的數據方面，根據歷史資料顯示，1959 年到 1987 年，臺商投資泰國的金額累計只有約 2 千萬美元左右，但 1988 年單一年度臺商投資泰國的金額就達到 1,188.6 萬美元，是過去 28 年總和的一半多，1989 年時達到 5,160.4 萬美元，到了 1990 年時，臺商投資泰國的金額就已經達到 1.49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古鴻廷，2003：41），除了原先的中小企業外，也有更多中大型企業於此時前往投資，包括：泰達電、泰金寶、光寶、南僑、統一等。

臺灣為了不被邊陲國家趕上而前往泰國投資，但泰國在吸引外資的部分也面臨其他邊陲國家的競爭，尤其是中國大陸，國際政經情勢與兩岸關係變化之快也影響到臺商海外投資佈局。政府於 1987 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中國大陸趁勢於 1988 年發布「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定」，許多臺商於是藉著探親之名前往大陸進行投資考察。中共政權於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確立以「經濟開放贖買政治民主」（趙思樂，2017：28），臺商則適時補上歐美民主國家外資撤離後留下的空缺。1992 年 1 月 17 日，鄧小平從北京搭乘專用列車南下廣州視察，發表了「發展才是硬道理」，以及著名的「貓論：不管是黑貓白

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等重要「南巡講話」後，加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幅度。

中共為了要急起直追亞洲四小龍等國的出口導向工業化，於1994年決定讓人民幣大幅貶值，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從1993年12月31日的1:5.8，直接貶值到1994年1月1日的1:8.7，幅度高達33%，除了鼓勵陸資企業出口外，更是大幅降低臺商與其他外商進入大陸的投資門檻。在語言相通且投資成本更低廉的條件之下，政府於1991年大開西進投資的綠燈，公布「對大陸地區投資及技術合作管理辦法」，許多臺商紛紛前往大陸投資，部分東南亞臺商也因而將生產線移至中國。1991年時臺商赴大陸投資的金額約為1.74億美元，1992年為2.47億美元，但到了1993年達到31.68億美元，短短三年的時間，成長了17倍，因而引發政府的關切（古鴻廷、莊國土，2005）。

臺商一窩瘋前往大陸投資，也讓政府開始擔心臺灣經濟會過於依賴中國大陸，往後恐怕會受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控制。也因此政府在1993年底時推出「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1994年初的時候由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宣布，並正式定名為「南向政策」，希望可以分散臺商海外投資風險。同時1996年李登輝訪美引發中國大陸強烈抗議，爆發台海飛彈危機，政府對大陸投資被迫喊出「戒急用忍」。2000年臺灣出現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後持續推動新南向政策，對大陸投資政策則由「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轉變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儘管如此，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當年臺灣前往大陸投資金額首度突破一百億美元，並於2010年達到歷史新高的140.62億美元，約是1991年開放時的82倍左右。

政府希望透過南向政策鼓勵臺商前往東南亞投資，但臺商赴泰國的投資金額卻從1990年的1.49億美元一路下滑至1997年的5754.6萬美元。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政府也很快核定「加強對東南亞及澳、紐地區工作綱領」，持續推動南向政策，希望鼓勵臺商投資東南亞協助當地經濟復甦，1998年臺商赴泰國投資金額也增加至1.31億美元。可惜好景不長，2002年時跌到596萬美元的新低點，退回到約1987年時的水準。

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過去有許多學者討論過，最知名的莫過於日本政經研究大師詹隼（Chalmers Johnson）於1987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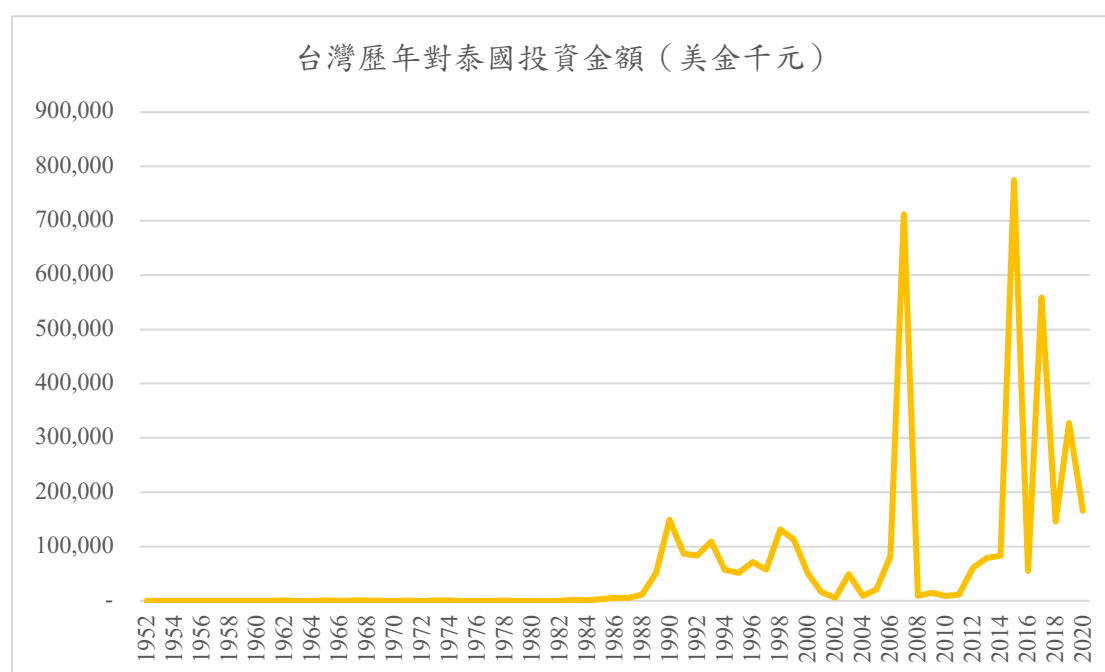
發表的「政治制度與經濟表現」(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文。泰國從 1960 年代開始發展經濟，在政治制度上主要維持著軍人統治的威權體制，壓抑民間部門，禁止勞工與環保等運動，同時也犧牲北部與東北部民眾的利益，堆砌以曼谷為中心的泰國經濟發展，成為東南亞四小虎。但從 1992 年開始進入民主化進程之後，民間部門的力量興起，就如同先前臺灣的發展一樣，民間部門開始透過國會選舉或是商業利益影響政治決策，貪污腐敗的政商關係最終導致了 1997 年的冬陰功危機 (Tom Yam Kung Crisis)⁴，亞洲各國經濟遭受嚴重打擊，也連帶影響了傳統臺商投資泰國的信心。

但泰國於 1998 年危機之後大力推動「驚奇泰國」(Amazing Thailand)國家級觀光旗艦計畫，2001 年泰國正式進入一千萬旅客的觀光大國，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泰，泰國的觀光客人數達到將近四千萬人次，蓬勃發展的觀光產業也吸引了不少以運輸、房地產、人力仲介、旅遊與餐飲等服務業為主的年輕臺商進入，其中更包括這幾年極受東南亞民眾喜歡的珍珠奶茶，包括：CoCo、歇腳亭、日出茶太、鹿角巷、幸福堂、一芳水果茶、茶湯會、KOI Thé (50 嵐的東南亞品牌)，甚至在曼谷市中心的 Central World 都可以看到臺灣平價咖啡廳路易莎的身影。

然而從 2005 年下半開始，紅衫軍與黃衫軍兩陣營進行超過 20 年的政治鬥爭，政治情勢惡化連帶影響到經濟投資環境。2001 年塔克辛 (Thaksin Shinawatra) 率領泰愛泰黨 (Thai Rak Thai Party) 以將近過半的席次贏得大選，並順利當選總理一職。其推出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政策，在長期受到政府經濟發展政策忽略的北部與東北部大受歡迎，2005 年更囊括六成的選票連任，但同時也引發以保守勢力為主的「君權網絡」(Network Monarchy) 反撲，包括：皇室、司法、軍方以及民主黨 (Democrat Party) 不斷透過非民主的方式推翻民主選出的政府，其間經歷了 2006 年 9 月 19 日與 2014 年 5 月 22 日兩次軍事政變，兩度解散紅衫軍政黨的司法政變：泰愛泰黨與人民力量黨 (People Power Party)，三度透過司法判決將民選總理趕下台：薩瑪 (Samak Sundaravej)、宋猜 (Somchai Wongsawat)、盈拉 (Yingluck Shinawatra)，以及民主黨政府在艾比希 (Abhishit Vejjajiva) 的主導下，

⁴ 由於泰國菜最有名的餐點為冬陰功湯 (臺灣大多稱為酸辣蝦湯)，也因此 1997 年 7 月 2 日於泰國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又被稱為冬陰功危機。

於 2010 年 5 月中旬針對抗議的紅衫軍群眾進行血腥鎮壓，造成 90 餘人死亡，一千五百餘人受傷，成為泰國近代政治史上最嚴重的傷亡事件。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每兩三年上演一次的街頭抗爭暴力事件，讓海外投資者躊躇不前，臺商對泰國的投資金額也呈現高低起伏的震盪。除了傳統臺商叫苦連天之外，更讓後進以服務業為主的臺商大喊先前賺得都不夠賠。



根據蕭新煌教授等人指出，臺商具有兩大特質：「外向性」與「網絡性」（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2002：19）。泰國臺商所展現出的外向性，也就是在世界體系下的全球鑲嵌我們已經介紹完畢，接下來我們將重點轉移到泰國臺商的網絡性，探討臺商落地泰國的在地鑲嵌。

許多學者的研究指出網絡關係是華人企業相當重要的特徵，對此大多集中在「關係資本主義」（Guanxi Capitalism）的研究論述。行動者在從事經濟行為時，其行動是在人際關係網絡中進行的，因此必然會受到社會脈絡的制約，也就像 Mark Granovetter 於 1985 年所提出的「鑲嵌性」（embeddedness）概念：在現代的產業社會中，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網絡之中，而且被他們所處的網路地位

所影響（戴萬平、黃勇富，2019；蕭新煌、龔宜君，2002）。

臺灣企業的組織網絡結構，基本上是建立在家族式網絡，並延伸擴展至非家族式的個人關係網絡，而特定網絡中成員間的信任關係，是網絡協調整合的重要機制。如此的網絡大致上可以區分為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與關係網絡（Guanxi Network）。首先在生產網絡方面，臺商在海外生產網絡的建立，大部分是將臺灣所建構的生產網絡移植與延伸。臺商前往海外設廠時，會要求其配合的下游廠商，一起前往海外據點從事生產活動，達成移地生產網絡的群聚效應。另外則是關係網絡，臺商在前往海外後，會與當地的企業組織與政府合作，特別是東南亞的華人企業因為種族與文化上的相近性，成為臺商初期建立關係網絡的重要基礎（周素卿、陳東升，2001，2002）。

除此之外，對於剛落地泰國的臺商來說，其實更需要的或許是來自臺灣鄉親的協助。根據顧長永教授指出，臺灣到東南亞投資設廠之後，組織臺商協會或相關的聯誼組織，是很自然也很重要之事，而這些組織大致上提供同鄉聯誼、團結力量與資訊提供等功能（顧長永，2001）。泰國臺商相關組織，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為商會組織，主要有二⁵：

首先是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在余聲清先生的努力奔走下創立於1992年10月，並成為創會理事長。1993年4月正式成為泰國政府法人組織，成為政府南向政策的後盾。余聲清先生擔任第一與第二屆理事長任內，為臺商子女的教育，大力奔走號召成立中華國際學校，並奔走亞洲各國成立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使本會成為臺商會組織的發源地，也是臺商海外學校的創始地，奠下基石。目前在總會下設有：曼谷、拉加邦、吞武里、春武里、泰南、普吉、泰北、呵叻等15個在地臺商聯誼會⁶。

第二則是泰國華商經貿聯合會，為「全球華商經貿聯誼總會」（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Traders Alumni）泰國分會，總會於1999年3月創會在臺北，2013年更名「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而泰國華商經貿聯合總會於1994年10月25日，經僑務委員會協助在泰國

⁵ 以下有關於泰國臺商相關組織之資料，主要由 T-TECH 泰國-臺灣 (BDI) 科技學院副校長李智偉博士提供，在此一併致謝。

⁶ 有台商私底下表示泰國過多的台商聯誼會，反而分散了台商的力量，希望政府可以適時出面加以整合，集中力量發展。

成立，成立初期名為「泰國華商經貿研習班學員聯誼會」，成立宗旨為促進海內外華商交流合作，聯繫歷屆僑委會經貿研習班海外華商學員。

筆者過去皆與這兩大商會組織有合作經驗，包括協助泰國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與筆者所服務的佛光大學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同時也在已故正修科大戴萬平教授的居中牽線下與泰國華商經貿聯合會進行洽談往後合作，同時在李智偉博士的協助下，與張玲琴博士所領導的TECH 泰國-臺灣 (BDI) 科技學院進行多項合作計畫。顯見泰國臺商在事業有成之後，也願意與臺灣的學校進行合作，給予臺灣年輕學子實習等機會，讓其提早體驗東協的職場文化與經驗。

第二大類為鄉親與宗教組織，最主要的代表機構為泰國臺灣會館。1946年在泰臺人正式成立「臺灣同鄉會」，推紀澤來為首任主席，後為加入當時的泰華七屬會館之列，於1947年更名為「泰國臺灣會館」。隨著來泰臺商漸多，經歷數屆會長幫忙下，擴增土地與更新會館新址，1997年1月12日新館開館，成為臺灣人在泰的重要組織。其他的鄉親組織包括：劉樹添與旅居泰國的鄉親於2007年3月31日成立的泰國臺灣彰化同鄉會；在余聲清號召下於2006年10月22日成立的泰國華僑協會，以及泰國臺灣客家同鄉會、泰國海華協會等。至於臺灣在泰國的宗教組織有先前提及的暹羅代天宮外，尚有泰國南遙媽祖宮、靈鷲山泰國禪修中心、慈濟基金會泰國分會、法鼓山泰國護法會、中臺禪寺泰國曼谷分院-泰佛寺、國際佛光會泰國曼谷協會（佛光山泰華寺）、泰國一貫道總會等，提供在泰國之十五萬臺灣僑民心靈與精神寄託。

第三大類則為臺商經營事業有成後，融入當地社群，所成立的聯誼性質組織，除了挽那扶輪社、大玲昌（旅泰臺商）獅子會等社團組織，以及臺商為配合泰國政府的反毒及防範犯罪所成立的泰國工廠警察（國際）協會外，不得不提由熱心公益的僑務諮詢委員何素珍，也就是泰國臺商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何姐，於2007年召集五十位臺商所組成泰國曼谷國際機場移民局義警隊，這些臺商大老闆暫時放下繁重工作，排班於機場服務來自全世界的旅客，協助旅客轉機、引導查看填寫入境表格、為移民局官員翻譯等。相信不少讀者都曾於飛抵曼谷素萬那普國際機場（Suvarnabhumi Airport, BKK）時，在入境櫃檯或落地簽辦理處接受過他們的幫助。操用著熟悉的語言與親切的態

度，減少旅客入境泰國時的緊張與焦慮，可謂是十足的臺灣之光。

臺灣歷經從 1960 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之後，取得不錯的成效，但也出現生產成本增加等困境，許多企業開始尋找另外出路，展現出臺商堅韌的外向性。而當臺商落地泰國後，因為網絡性所組成的組織，除了能提供後進台商協助之外，更多臺商在事業有成之後，也能走出臺商圈，成立許多當地組織，深入泰國的每一個角落進行社區服務，回饋社會，展現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的具體實踐。但對於這群泰國臺商來說，越深耕泰國也越模糊了家的想像。

在先前的調查中顯示，泰國臺商返臺投資的意願是東南亞六國最低，僅有 25.5% 臺商企業考慮未來返臺投資，56.7% 的臺商現階段不考慮，17.7% 的臺商未來也不考慮（僑委會，2018）。但 2019 年底的一場疫情讓一切充滿變數，國際政經環境已與當初調查狀況不可同日而語，加上政府推出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有越來越多的臺商開始探尋回臺投資之路，然而對於早已在泰國落地生根的臺商來說，許多現實層面的考量卻讓他們回不了臺。

先前由楊雅喆導演所拍攝滅火器樂團「長途夜車」(Southbound Night Bus) 的 MV，2017 年 7 月 11 日上線後，已經累積了將近一百四十萬的觀看次數，音樂版的聆聽次數則超過一千五百萬次，底下總計超過兩千則的留言，道出了很多在日本、英國、美國、香港、大陸、東南亞，甚至遠在西非打拼的臺灣人心聲。MV 裡面的楊耀文，也是滅火器樂團主唱楊大正的爸爸，在寮國打拼的故事相信讓很多泰國臺商有感，當初跟楊耀文一樣自詡為「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認為自己永遠有機會，搭上了一班 Southbound Night Plane 勇敢南下。

想不起來那時怎樣離開
漂浪的生活也漸漸習慣
迷糊經過這麼多年
認識了很多道理
卻找無一條路回去

我漸漸失去自己
在競爭的花花世界

拐彎抹角是辜不二終
看不到出口在哪裡
也不知道該去哪裡
我只是暫時失去方向
我一定會找到
回去的路

全球化已經將地球輾壓為平的，但對泰國臺商而言，家到底是臺灣還是泰國呢？或許就如同 2021 高雄獎影像暨科技媒體藝術入選獎洪鈞元的作品「我與母親的民國六十四年」中所寫道：「家對我來說定義非常模糊。我不知道哪一個算是我家」(Home is a vague concept for me. I don' t know which one is my home)。

參考文獻

- 古鴻廷，〈近年來臺商在東南亞之經貿活動〉，載於古鴻廷與莊國土主編，《當代華商經貿網絡：海峽兩岸與東南亞》（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3）。
- 古鴻廷、莊國土主編，《當代華商經貿網絡：海峽兩岸與東南亞》（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3）。
- 周素卿、陳東升，〈後進者的全球化：東南亞台灣企業地域生產網絡的建構與對外投資經驗〉，《都市與計畫》第28卷第4期（2001），頁421-459。
- 周素卿、陳東升，〈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載於蕭新煌、王宏仁與龔宜君主編，《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2002）。
- 胡祖慶譯，《政治經濟學導論》（台北市：五南，1990）。
- 曹淑瑤，〈戰後臺灣與泰國的經貿發展〉，載於古鴻廷與莊國土主編，《當代華商經貿網絡：海峽兩岸與東南亞》（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3）。
- 僑務委員會，《2017年海外臺商經濟年鑑：東南亞六國篇》（台北市：行政院僑務委員會，2018）。
- 趙思樂，《他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新北市：八旗文化，2017）。
- 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泰國臺商投資環境報告》（泰國曼谷：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2021）。
- 顧長永，《台商在東南亞—台灣移民海外的第三波》（高雄市：麗文文化，2001）。
- 戴萬平、黃勇富，〈泰國華人企業的關係網絡運作〉，《東亞季刊》第50卷第1期（2019），頁 29-76。
- 蕭新煌主編，《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市：巨流，1984）。
- 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2002）。
- 蕭新煌、龔宜君，〈台商的歷史、性格與未來發展〉，載於蕭新煌、王宏仁與龔宜君主編，《台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2002)。

龔宜君，《出路：台商在東南亞的社會形構》(台北市：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5)。